

# 中日韩青年人文教育合作： 以“亚洲校园”项目为例<sup>\*</sup>

董亮 繆高意

**【内容提要】**青年交流是公共外交和国际人文交往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当前，在中日韩青年交流活动中，人文教育合作已经成为核心内容。三国政府已经开展了多个青年项目，涉及众多知名高校，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政策设计角度看，中日韩通过教育交流，分享三国优质教育资源，取得相互理解，达成本地区发展的政治经济共识，最终形成沟通理性。这些交流累积将有利于弥合民众多元价值观与国家外交决策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以“亚洲校园”项目为例，多种教育交流课程与活动为三国未来合作提供知识储备和共同理解，并已经在三国青年精英中形成了一定的累积效应和口碑。从三国深化合作角度看，大力发展三国青年人文教育交流仍具有深远意义，这是因为合作项目的受益者日后可能成为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推动力，为广泛的功能领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亚洲校园 公共外交 青年人文教育交流 青年交流 中日韩合作

**【作者简介】**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全球治理与亚洲区域合作。繆高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生。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 一 引言

日韩与中国地缘相近、经济交往密切，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邻邦。中日韩三国不仅是东亚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担负着推动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任，也是维护地区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未来3~5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研究”（项目批准号：19VDL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三国人口总数超过亚洲的 1/3、世界的 1/5，经济总量占亚洲的 70%、全球的 23.1%<sup>①</sup>，可谓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地区引擎之一。中日韩合作不仅能体现三国的共同利益，契合三国民众的愿望，也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各方面因素，三边合作尚未达到理想水平，有待进一步深化。而三国相互认知和好感度对推进合作意义重大，应该予以重视。

在国际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2019 年关于对华认知的调查中，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最低的，仅 14%，韩国对华好感度也仅有 34%<sup>②</sup>。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关于亚太地区各国认知的调查数据显示，对华好感度在不同的年龄间存在差异，在 19 个国家中，18~29 岁的受访者比 50 岁以上的受访者更可能对中国抱有好感<sup>③</sup>。这反映出，中日韩三国需要夯实民意基础，为三国深入合作提供不竭的民意资源，而青年的世界观还在形成中，思想观念没有固化，成见较少，对新观点新思想新事物态度开放，最有可能受到人文交流的影响；而且青年代表国家的未来，是未来倡导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因此，应思考如何改进青年公共外交工作、加大工作力度。对于中日韩而言，要实现更深入的合作，仅仅依靠政治合作推动是不够的，广泛的民意基础亟待加强。其中，人文交往是国际合作中促进信任的重要领域。这方面，青年人文教育交流是应该特别予以重视的。

为了三国未来的发展与合作，中日韩均十分重视青年的培养与交流。近年来，中日韩三国扎实推进了一系列重点人文交流项目。其中，“亚洲校园”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该项目自 2011 年启动，至 2020 年，中日韩参与交流的学生已达到数千人。目前，“亚洲校园”项目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在培养中日韩协同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亚洲校园”项目成功实施象征着中日韩三国不断增进理解，创造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教育空间，展现了三国政府实现东北亚合作的决心。

然而，目前对中日韩三国间青年公共外交和交流及其对三国合作的研究仍然十分不足。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正是中日韩三国青年交流如何促进三国合作。具体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公共外交与青年人文交流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二部分对本文的概

①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19 年中国总人口数为 13.98 亿，GDP 为 14.343 万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日本总人口数为 1.26 亿，GDP 为 5.082 万亿美元；韩国总人口数为 5164 万，GDP 为 1.642 万亿美元。详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March,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indicator/24>.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Attitudes toward China”, December 5,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12/05/attitudes-toward-china-2019/>.

念和论述逻辑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分析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的机制与作用,最后以“亚洲校园”为案例探讨中日韩青年交流的优势与不足及其对三国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 二 公共外交与青年人文交流

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家间时常通过学生、学者交流访问,举办民间文体活动等,加强人文交流,以获得发展关系的更深厚的民意基础。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不仅仅是“文化”和“艺术”本身,更重要的还是一国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人文交流的意义正是以文化为纽带,加强文化交流、文化理解,从而在软实力层面形成良好的国家间关系,长期友好的关系最终将使国家在决策中更加包容,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改善<sup>①</sup>。在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区域合作、地区政治互信与依赖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三国民间交流和相互理解也同样重要<sup>②</sup>。

### (一) 公共外交与青年交流的文献回顾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学术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sup>③</sup>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我们认为,青年公共外交可以定义为,在政府的主导下,青年<sup>④</sup>作为外交主体,以青年交流为主要形式,了解、影响对象国青年及其他群体的认知,影响对象国舆论,提升本国在对象国的形象和影响力的外交活动。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如包括国际广播在内的信息活动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sup>⑤</sup>。对此,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进行过充分论述,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① 邢丽菊《关于加强中韩人文交流的思考》,《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112~124页。

② *Japan, China, and ROK Trilateral Youth Summit 2016 Program Report*,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195447.pdf>.

③ 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105~112页。

④ “青年”在国际上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本文参照联合国的标准,将“青年”定义为年龄在15岁至24岁之间的人。该定义是在筹备国际青年年(1985)的背景下提出的,并经大会1981年第36/28号决议认可。本文所讨论的青年均依据以上定义。详见《青年》,联合国官网, <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youth-0/index.html>。

⑤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2008, pp. 94-109; Jan. Melisse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3-27; Eytan Gilboa,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2008, pp. 55-77; (转下页注)

Deutsch) 基于欧洲区域一体化实践, 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 提出沟通交往理论, 强调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对于政治共同体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克拉托赫维尔 (Friedrich Kratochwil) 运用言语行为和沟通交往理论说明了国际规范促进人类理解、解决冲突的条件<sup>①</sup>。传统的沟通交往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行为体、政府间的沟通, 认为大国之间的持续沟通有益于化解矛盾, 走向合作。

从行为体角度看, 公共外交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三个方面, 其中政府是主导, 社会精英是中坚, 普通民众是基础<sup>②</sup>。公共外交包括“民间外交”, 但是它的内涵更丰富, “公共外交”囊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 包括双方或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等各种直接交流<sup>③</sup>。传递信息和塑造正面形象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同时, 公共外交也包括建立长期关系, 为政府政策创造有利环境<sup>④</sup>。

## (二) 公共外交与青年人文交流

目前, 学界关于青年交流在公共外交中作用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为对象, 比如美国、日本等。美国的公共外交开展较早, 也较为成功。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双轨制的。一个轨道主要集中于媒体和消息传递, 另一个轨道则是文化和教育交流, 或公民外交 (citizen diplomacy)<sup>⑤</sup>。美国政府向来重视青年交流在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作用。贝拉米·卡罗尔 (Bellamy Carol) 指出, 美国的公共外交项目应以青年为目标, 因为青年群体更容易受到交流的影响, 他们在了解了有关美国的“事实”之后, 更倾向于改变刻板印

---

(接上页注<sup>⑤</sup>)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2008, pp. 31 – 54; Helena K. Finn, “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Engaging Foreign Audiences”, *Foreign Affairs*, 2003, pp. 15 – 20; 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er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2008, pp. 55 – 68; Giles Scott – Smith, “Exchange Programs and Public Diplomacy”,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Routledge, 2008, pp. 70 – 76; Pierre C. Pahlavi, “Evaluating Public Diplomacy Programme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2, No. 3, 2007, pp. 255 – 281; Peng Er. Lam, “Japan’s Quest for ‘Soft Power’: Attraction and Limitation”, *East Asia*, Vol. 24, No. 4, 2007, pp. 349 – 363.

① Friedrich V.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 – 12.

② 魏玲 《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 清谈如何产生效力》,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第39~58页。

③ 许利平、韦民 《人文交流与经略周边》, 《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 第16~18页。

④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2008, pp. 94 – 109.

⑤ Bellamy Carol and Adam Weinber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2008, pp. 55 – 68.

象。同时,青年群体有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的意见领袖和政策影响者<sup>①</sup>。因此,青年交流项目的影 响是深远而持久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公共外交,在文化和教育项目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多<sup>②</sup>。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交流项目是富布莱特项目。该项目为外国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在美国获得更高学位提供途径,也帮助更多的年轻政治领导人、学者、记者、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前往美国观察美国的机构,并会见同行,了解美国文化<sup>③</sup>。对富布赖特项目参与者进行的研究发现,99%的人表示对美国和美国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96%的人在回国后通过媒体、文化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sup>④</sup>。同样,日本也重视公共外交,试图通过漫画、动漫等形式展示其“软实力”。同时,新加坡学者蓝平儿(Peng Er Lam)也认识到了青年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作用,认为“鼓励外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是投资年轻一代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投资中,外国留学生作为日本教育制度的受益者,回国充当文化大使,会在本国和日本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sup>⑤</sup>。

青年交流在公共外交中至关重要。第一,青年的积极性对于公共外交有独特作用。青年人普遍具有热情、努力上进、充满理想、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勇于打破常规等积极性特征。青年参与公共外交,可以发挥独特优势,有破旧立新之效。同时,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开展青年外交活动有利于在青年人中消除偏见与刻板印象,传播国家文化,增进相互理解。第二,青年熟练掌握推动公共外交的新媒体技术。当前,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就是新媒体社交,而青年正是最熟悉新媒体的群体。青年充分利用微博、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进行沟通、交流,对于文化交流、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第三,青年群体庞大,影响力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世界青年报告》指出,2020年预计全球15~24岁的青年人总共有12亿,占总人口的15.5%<sup>⑥</sup>。因此,青年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都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日本以文化交流、青年交流为目的,与东盟十国开展柔道项目等活动<sup>⑦</sup>;韩国举办2017年独岛全球青年峰会

① Bellamy Carol and Adam Weinber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2008, pp. 55 – 68.

② Pierre Pahlavi “Evaluating Public Diplomacy Programme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2, No. 3, 2007, pp. 255 – 281.

③ Helena K. Finn, “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Engaging Foreign Audiences”,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2003, pp. 15 – 20.

④ Bellamy Carol and Adam Weinber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2008, pp. 55 – 68.

⑤ Peng Er Lam, “Japan’s Quest for Soft Power: Attraction and Limitation”, *East Asia*, Vol. 24, No. 4, 2007, pp. 349 – 363.

⑥ ECOSOC, *World Youth Repor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20, p. 40.

⑦ 由凯宇 《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公共外交及启示》,《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第2期,第85页。

(DGYS)，说服国际社会支持韩国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中的立场<sup>①</sup>；中国也主办过旨在打造青年领袖交流沟通平台的“与世界对话”活动<sup>②</sup>。与其他类型的公共外交主体相比，青年有自身的特点，具有独特优势，独具现实意义，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之一。当前，青年在公私部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等都高度重视青年参与，联合国于2018年发布《青年2030：联合国青年战略》(Youth 2030: The UN Youth Strategy)，旨在赋予青年更多权利<sup>③</sup>。目前，中日韩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性别不平等、环境保护、保护人权等诸多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三) 青年公共外交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一般而言，青年交流项目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人文交流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围绕沟通交流形成相互预期，塑造社会交往纽带，促使人文交流机制化。在青年外交的基础上，青年政治精英群体不断扩大，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后发主导群体。

这其中，青年公共外交最直接的体现是青年作为主体所进行的跨国沟通。沟通是人们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沟通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间沟通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具体内容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民间交流等。在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分类框架中，沟通行动是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它以理解为导向。

在沟通过程中，行为体展现出一种沟通理性。沟通理性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预设至少存在两个行为体，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沟通、讨论，希望获致相互理解和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决议<sup>④</sup>。沟通行动中，行为体体现出沟通理性，而语言活动是代价最小的博弈方式，是首选的博弈方式<sup>⑤</sup>。沟通理性赋予国家在互动中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可能。

在短期内，沟通产生信任。所谓信任就是关于另一方更愿意相互合作，而不是利用一方的合作信念<sup>⑥</sup>。在无政府状态中，陌生人相遇，信任度为零。如果双方间进行持续的对话，不断就言语行为的真实、真诚和正当性达成相互理解，依据建构主义互动论的原理，可以推知对方的伙伴身份将得以强化，彼此信任度会增加<sup>⑦</sup>。信任度加强，彼此的好感度便会有所提高，这将为国际合作提供良好的民众基础和舆论环境。长期的沟通同样也可能促进国际合作。

① Eriks Varpahovskis “Korean Public Diplomacy in Practice: Dokdo Global Youth Summ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ign Studies*, Vol. 10, No. 2, 2017, p. 63.

② 《用自信与世界青年对话》，[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6/26/content\\_3296171.htm](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6/26/content_3296171.htm)。

③ UN, “Youth 2030: The UN Youth Strategy”, September 24, 2018, <https://www.un.org/youthenvoy/youth-un/>。

④ 惠耕田 《沟通理性与国际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24~31页。

⑤ 赵汀阳 《冲突、合作与和谐的博弈哲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6~16页。

⑥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⑦ 惠耕田 《沟通理性与国际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24~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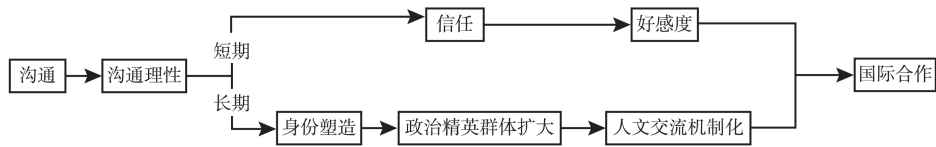


图1 青年公共外交促进国际合作的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与此同时，身份意味着自我意识，就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身份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通过思想、规范、价值观、符号、话语和实践构建的，通常被归入“文化”类别。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身份”这一概念，以强调国家的社会建构性质及其利益<sup>①</sup>。国家拥有共同的集体身份，形成集体偏好和行动。而个体同样可以在互动中产生一种“自我感觉”和社群意识，塑造身份。价值观念上的认同，即主要价值观的相互兼容性和协调性导致各政治单位之间产生“共同体感”，进而为国际合作提供结果和机制保障。

### 三 公共外交背景下的中日韩青年人文教育交流机制

2008年以来，中日韩三国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提升伙伴关系，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环保合作和文化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国际形势稳定。三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三边人文教育交流合作，每届领导人会议都将青年交流活动、教育合作写入会议文件。

目前，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机制（见图2）是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领导下开展的。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由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主导，三国合作秘书处与三国外交部门合作举办中日韩青年峰会，并组织青年大使计划等针对青年的交流项目和活动；在教育合作领域，定期召开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见表1）、工作层级别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会议，其中，“亚洲校园”项目是三国教育合作的主要活动。

目前，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机制较为完善，三国对此也持较为积极的立场。一方面，高级别政府层次机制活跃。2010年三国领导人会议宣布扩大三国政府主办的青年交流活动规模，并推动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sup>②</sup>。2011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中提到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是三国间加深互信、增进面向未来的合作关

<sup>①</sup> Felix Berenskoetter,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218.

<sup>②</sup>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5日，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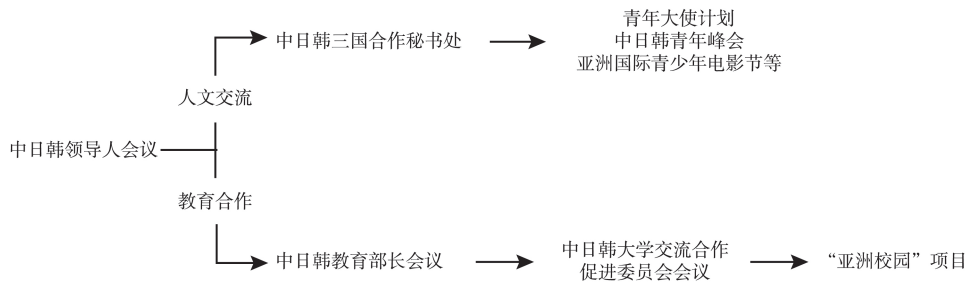


图2 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历届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及相关内容

届次	时间地点	相关内容
1	2016年 韩国首尔	签署《中日韩三国教育合作首尔宣言》，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三方强调中日韩互为近邻，开展面向未来的教育合作意义重大，倡议三国继续实施并扩大“亚洲校园”项目，举办不同类型的和中日韩大学校长论坛，并在创新人才培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携手加强语言教学等方面推动深度合作
2	2018年 日本东京	签署《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三方表示将继续着力推动学生与青少年交流，拓展实施“亚洲校园”项目，并加强三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
3	2020年 中国北京	签署《第三届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着力加强学生与青少年交流、推动“亚洲校园”项目升级、探索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增进区域相互理解、提升教育服务社会能力，为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新闻报道等资料自制。

系的重要内容，并决定在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框架下举办“未来论坛”，促进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sup>①</sup>。2012年，为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三国决定为建立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机制继续做出努力，并启动“亚洲校园”高等学校交流试点项目<sup>②</sup>。后由于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上三国皆采取强硬立场，领导人会议搁置两年。2015年，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三方签署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再次表达了对青年人文交流及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视。宣言中提到，三国将继续举办“中日韩青年友好会见”“中日韩青年领导者论坛”“中日韩青年峰会”等青年交流项目，促进三国未来领袖之间的交流。同时，会议决定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扩大三国在教育领域的合

① 《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中国新闻网，2011年5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5-22/3057809.shtml>。

② 《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新华网，2012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5/14/c\\_111944937.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5/14/c_111944937.htm)。

作,进一步深化“亚洲校园”项目<sup>①</sup>。2019年年底,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表达了对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教育、人员交流活动,增进三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期待<sup>②</sup>。

另一方面,多层次青年交流机制日益多元丰富。领导人会议、教育部长会议和三国合作秘书处从政策实施者的角度设计青年公共外交的机制,与此同时,三国青年也在一系列活动中参与到交流进程中来。当前,在中日韩青年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活动主要有“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sup>③</sup>、“中日韩未来论坛”、中日韩青年领导者论坛<sup>④</sup>、中日韩青年峰会、青年大使计划、亚洲国际青少年电影节<sup>⑤</sup>和“亚洲校园”项目。

其中,青年大使计划和中日韩青年峰会是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指导下展开,影响力较大、举办较为持续的项目。青年大使计划致力于为中日韩青少年提供体验东北亚地区合作前沿的外事工作机会,主要面向热衷于国际合作并有志投身外交事业的未来中日韩领导人。该计划为青年提供了解三方合作机制和目标的机会,并积极吸纳三国青年领袖对未来三边关系的见解。一般而言,青年大使计划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会前培训、团队合作项目和文化旅游。会前培训是三国青年就三方合作、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等各领域开展专题讲座和实地考察,其间还会进行一系列讨论和对话,加深青年大使对中日韩三国合作的了解。在会前培训的基础上,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个团队合作项目,以展示他们对三方合作的兴趣和理解。在完成培训和项目后,青年大使将前往各国旅游景点开启文化之旅。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参与到青年大使项目中来。例如,该项目在2017年吸引了18名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杰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了包括历史与发展、政治事务、经济合作,以及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讲座。青年大使还参观了韩国外交部、中国和日本驻韩大使馆等政府机构,以及东盟—韩国中心、欧盟驻韩代表团和牙山政策研

①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2015年11月2日,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5-11/02/content\\_4630213\\_4.htm](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5-11/02/content_4630213_4.htm)。

②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国外交部官网,2019年12月24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l\\_674979/dnzt\\_674981/lzlt/dbczrhldrh\\_698959/zxxx\\_698961/t172741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l_674979/dnzt_674981/lzlt/dbczrhldrh_698959/zxxx_698961/t1727417.shtml)。

③ “中日韩青年友好会见”活动是为落实2007年1月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成果,于2007年8月由团中央以全国青联名义发起并主办的一项中日韩三国青年交流项目,此后三国政府每年轮流举办,该活动现已纳入三国领导人会议确认内容。此项活动旨在通过各种文化体验和互动活动,使三国青少年加深对对方国家的了解,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青少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④ 中日韩青年领导者论坛是根据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倡议而举办的青年交流项目,旨在为中日韩三国青年优秀人才创造更多对话机会,以便加深理解、增进互信,为中日韩三国结成更加牢固的信赖关系奠定坚实的青年基础。自2002年起,论坛每年分别在中国、日本、韩国三地举办,为期11天。

⑤ 为进一步促进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和国际文化交流,在成功举办了三届“大韩民国国际青少年电影节”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促进会、韩国青少年文化研究所、日本京都映画俱乐部于2006年10月在韩国首尔签署《共同宣言》,决定以“未来影像”为总标题,以展映活动(电影节)的形式每年举办一次。

究院等<sup>①</sup>。

而中日韩青年峰会是中日韩三国在 2015 年协商决定成立的。每年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 定期召开会议, 就地区热点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交流, 以增进三国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增进三国青年对日韩合作的认识和共识。近三年的中日韩青年峰会分别关注了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粉尘及环境污染治理三方合作、奥运会三边合作, 以及老龄化社会与区域振兴、旅游与区域振兴、多元文化与区域振兴等地区热点问题, 三国青年就这些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合作磋商, 探讨促进东北亚地区协同发展<sup>②</sup>。在中日韩青年峰会中, 三国青年扮演外交人员, 切身体验国际问题磋商, 对日韩三边合作形成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更加关心地区、全球问题, 对承担全球责任有了切身体会。可见, 上述活动能够促进中日韩青年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培养兼具东亚意识和全球视野的新一代青年领袖。

总的来说, 目前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机制较为健全, 三国领导人会议为三国青年公共外交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教育部长会议、三国合作秘书处具体制订青年教育交流计划, 为三国青年提供参与公共外交的机会。中日韩三国的交往互动不仅在于经济贸易合作、政府间对话, 三国民众, 尤其是三国青年间的交流同样至关重要。在中日韩青年公共外交中, 青年在人文交流和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中沟通讨论, 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 取得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 形成沟通理性。彼此的信任感在交流中增加, 对他国文化、经济和政治更加理解, 有利于改善三国间的好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 好感度的改变体现在民意层面, 如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他国文化的喜爱、对合作政策的支持, 这有助于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长期有效的青年公共外交有助于加深对各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特别对于共处某个区域的国家来说, “对一体化持久性的认识越强, 认同感的吸引力就越大, 反对团体就越不愿意正面攻击某个一体化方案”<sup>③</sup>。中日韩三国的人文交流有利于弥合民众多元价值观与国家外交决策之间的矛盾<sup>④</sup>, 进而塑造亚洲身份。若中日韩三国青年交流活动的受益者在数年后参与政治实践, 成为政策制定者, 可望进一步推进三国青年公

① 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TCS Organized the 2017 Young Ambassador Program (YAP) – 2017. 7. 31 ~ 8. 11”, August 11, 2017, <https://www.tcsyap.org/single-post/2017/08/11/TCS-Organized-the-2017-Young-Ambassador-Program-YAP-%E2%80%93-2017-7-31-811>.

② 《2017 中日韩青年峰会成功举行》, 外交学院官网, [http://www.cfau.edu.cn/art/2017/10/20/art\\_2983\\_63122.html](http://www.cfau.edu.cn/art/2017/10/20/art_2983_63122.html) 《2018 年中日韩青年峰会在韩国首尔圆满落幕》, 外交学院官网, [http://www.cfau.edu.cn/art/2018/9/29/art\\_2983\\_68102.html](http://www.cfau.edu.cn/art/2018/9/29/art_2983_68102.html) 《2019 年中日韩青年峰会在日本成功举行》, 外交学院官网, [http://www.cfau.edu.cn/art/2019/8/30/art\\_2983\\_74673.html](http://www.cfau.edu.cn/art/2019/8/30/art_2983_74673.html)。

③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第 556 页。

④ 郦莉 《富布赖特项目中的文化互动机制》, 《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第 2 期, 第 94 ~ 98 页。

共外交,提供政治背书、资金支持,推动青年公共外交稳定化、机制化。这部分政治精英也更有可能对中日韩三国文化抱有更具包容性的理解,对三国合作持更积极的看法,从而有利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深化。

## 四 案例分析 “亚洲校园”项目

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日趋紧密。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是教育全球化,在全球教育、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sup>①</sup>,培养全球化人才对于国家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7提到,要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就包括提升全球公民意识,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sup>②</sup>。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中心教育理念,当前,“国际理解教育”和“全球教育”成为国际社会日益推广的新型教育理念。国际理解教育旨在增进不同文化、种族、国家背景的人群的相互了解和宽容,进一步认识世界,担负“世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共同解决经济竞争与合作、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共存、和平与发展等方面的全球问题<sup>③</sup>。全球教育是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对教育的挑战而提出来的公民教育新理念,是指为认知并理解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并为实现世界范围内所有人共享的公平、正义和人权而努力<sup>④</su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三国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建设,致力于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与国际接轨,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

亚洲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球舞台上越来越处于中心地位,在此背景下,亚洲地区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和相互团结的意识非常重要,“亚洲校园”计划的诞生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sup>⑤</sup>。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时提出了关于加强三国大学交流合作的设想。在此基础上,三国教育部门成立了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研究推进大学交流、学分互换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等问题<sup>⑥</sup>。

### (一) “亚洲校园”项目的提出与发展

“亚洲校园”(CAMPUS Asia),全称为“亚洲大学生集体行动交流计划”(Collective

① 罗嘉懿等 《教育全球化趋势下的人才培养——以开展高校“模拟联合国”活动为例》,《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Z2期,第41页。

②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Knowledge Platfor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③ 《全球公民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https://zh.unesco.org/themes/gced>。

④ 全球教育指南工作组 《全球教育指南》,里斯本:欧洲委员会北南中心,2008,第10页。

⑤ Ja-hyun Chun, “Can CAMPUS Asia Program be a Next ERASMUS?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AMPUS Asia Program”,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4, No. 3, 2016, pp. 279-296.

⑥ 「Campus Asiaについて」, <http://campus-asia.c.u-tokyo.ac.jp/zh/about/>.

Action of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是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实施, 旨在促进三国大学交流与合作, 尤其是学生流动的项目<sup>①</sup>。“亚洲校园”项目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构想期、试点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构想期始于2009年, “亚洲校园”计划首次提出。在2009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 三国领导人在“共建东亚共同体”的主题下, 提倡加强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 提出“亚洲校园”的构想<sup>②</sup>。2010年,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会召开两次会议, 达成共识并通过指导性文件《中日韩有质量保障的大学交流合作指导意见》和《中日韩大学交流“亚洲校园”计划框架》。

第二阶段试点期是2011年至2015年, 在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大学中开展了10个试点项目(详见表2)。2011年, “亚洲校园”试点项目正式开展。2012年4月, 正式开始学生交流<sup>③</sup>。2013年,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亚洲校园”项目的规模和范围, 同时加强项目质量监控<sup>④</sup>。2015年, 中日韩大学交

表2 “亚洲校园”项目试点计划

合作院校	项目名称
北京大学—一桥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亚洲商业领袖项目
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国际关系及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
清华大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韩国发展研究所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东北亚政策研究联合会
清华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	TKT“亚洲校园”项目
吉林大学—冈山大学—成均馆大学	核心人才培养项目—东亚地区共同利益的实现及传统文化的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名古屋大学— 成均馆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培养东亚地区具有法律、政治理念共识, 能够推动东亚共同体法制形成与发展的人才
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首尔 国立大学、浦项工科大学	可持续社会的亚洲教育合作门户—扩展化学、材料科学和技术的前沿
上海交通大学—九州大学—釜山国立大学	中日韩能源与环境领域研究生教育合作计划
复旦大学—神户大学—高丽大学	东亚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立命馆大学—东西大学	中日韩三方联合培养东亚地区跨世代人文精英之流动校园工程

资料来源: 教育部官网,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111/126420.htm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111/126420.html)。

- ① 《亚洲校园计划简介》,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2011年7月14日, <http://www.cdgdc.edu.cn/campusasia/yzxyjh/273837.shtml>。
- ② 《中日韩敲定未来合作大方向: 共建东亚共同体》, 凤凰网, 2009年10月11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enjiabaofangchao/news/200910/1011\\_8202\\_138260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enjiabaofangchao/news/200910/1011_8202_1382600.shtml)。
- ③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共识》,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2011年7月15日, <http://www.cdgdc.edu.cn/campusasia/zywj/273857.shtml>。
- ④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共识》,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2013年8月6日, <http://www.cdgdc.edu.cn/campusasia/zywj/279144.shtml>。

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试点项目终期联合质量监控标准及实施框架,并进一步讨论“亚洲校园”项目扩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sup>①</sup>。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丰硕成果,得到三国政府的认可。

第三阶段成熟期以试点结束、第一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召开为标志。2016年1月,第一次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提出通过“亚洲校园”项目拓展,推动亚洲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标志着“亚洲校园”项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sup>②</sup>。当前,“亚洲校园”项目已从2016年度起延长5年,新增9个项目(详见表3),淘汰2个项目,项目数量从原先的10个扩大到了17个<sup>③</sup>。可见,“亚洲校园”项目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通过中日韩三国高校联合授课,暑期和冬季项目、东亚学生会议等,项目为培育具有对东亚地区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理

表3 “亚洲校园”正式实施阶段新增项目清单

合作院校	项目名称
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	东亚杰出领袖共同培育计划
中国传媒大学—东京艺术大学—韩国国立艺术综合大学	中日韩国际动漫合作课程
山东大学—长崎大学—成均馆大学	中日韩联合培养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顶级工程师项目
上海海洋大学—东京海洋大学—韩国海洋大学	基于“中日韩教育一体化”的海洋科学技术领域共同教育项目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千叶大学—延世大学	植物与环境创新项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大阪大学—延世大学	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培养公共卫生研究领袖人才
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高丽大学	东亚全球领导力项目:多层次冲突解决与社会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东京学艺大学—首尔国立教育大学	东亚教师培养国际研究生院项目
同济大学—九州大学—釜山国立大学	促进人力资源主导下的亚洲可持续城市与建筑环境发展协同教育规划

资料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s78/A20/moe\\_863/201703/t20170309\\_298737.html](http://www.moe.gov.cn/s78/A20/moe_863/201703/t20170309_298737.html)。

①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共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5年4月10日, <http://www.cdgdc.edu.cn/campusasia/zywj/281887.shtml>。

② 《中日韩三国教育合作首尔宣言》,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6年1月31日, <http://www.cdgdc.edu.cn/campusasia/zywj/281889.shtml>。

③ 保留的试点项目包括:北京大学—一桥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亚洲商业领袖项目;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清华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TKT“亚洲校园”项目;吉林大学—冈山大学—成均馆大学,核心人才培养项目—东亚地区共同利益的实现及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名古屋大学—成均馆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培养东亚地区具有法律、政治理念共识,能够推动东亚共同体法制形成与发展的人才;上海交通大学—九州大学—釜山国立大学,中日韩能源与环境领域研究生教育合作计划;复旦大学—神户大学—高丽大学,东亚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立命馆大学—东西大学,中日韩三方联合培养东亚地区跨世代人文精英之流动校园工程。详见《中日韩“亚洲校园”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教育部官网,2017年3月9日, [http://www.moe.gov.cn/s78/A20/moe\\_863/201703/t20170309\\_298737.html](http://www.moe.gov.cn/s78/A20/moe_863/201703/t20170309_298737.html)。

解和独立思考能力、能够通过跨学科和国际合作、与他人携手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协同创新型人才做出了贡献<sup>①</sup>。

## （二）“亚洲校园”项目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亚洲校园”作为东北亚区域内较为成熟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友谊，深化和拓展区域内民意基础，推动区域内三国未来一代的认知趋同，对于中日韩三国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目前来看，这一机制很可能对未来的中日韩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亚洲校园”项目主要针对的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和已在地区学术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高校学者，他们是三国最有可能成为未来领导者的群体以及当前能够对中日韩合作提供切实有力支持的学术界人物。因此，“亚洲校园”项目的开展极有可能对三国合作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交流交换的方式，三国青年有机会前往其他国家学习，与外国青年分享信息、交换思想，就国际合作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和沟通，以获得相互理解。青年对他国因无知而产生的偏见在项目交流中消解，理解也有助于信任的产生。在他国的交流为青年提供了对于交流国真实、真诚的理解，有助于产生信任感，提高好感度。“亚洲校园”项目常态化以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到项目中来，更多的三国青年有机会去到外国交流，久而久之，会有更多的青年对中日韩三国有包容的理解，逐渐形成独特的东北亚社群意识。由于“亚洲校园”项目的参与者主要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这个群体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政治领袖的青年人群体之一。当“亚洲校园”项目的参与者未来参与地区事务治理时，相信会对中日韩合作有更积极的看法、更愿意推动三国合作。

## （三）“亚洲校园”项目展望

尽管“亚洲校园”项目可能对三国合作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项目也存在结构性局限，在项目设计、监督等方面也有不足。

首先，由于项目由三国教育部主导，易受三国政治关系状况的影响。“亚洲校园”项目源于三国政府的协议，政治支持、领导人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现实政治矛盾，项目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其次，项目进展较慢，缺乏整体规划。“亚洲校园”项目主要的执行机构是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决策模式是在每年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进展。然而，该会议在2016年以后就没有再召开，相关网页也停止了更新。目前项目的覆盖面有限，社会影响力不强，因此，未来项目的开展需要通过这一机制进行清晰而系统的愿景规划，以满足三国青年交流的实际需求。

最后，参与到项目中的中日韩青年也遇到了许多问题。虽然三国高校都提供了英语课

<sup>①</sup> 「Campus Asiaについて」、<http://campus-asia.c.u-tokyo.ac.jp/zh/about/>。

程,但是在实际的项目参与过程中,参与者会在日常生活和交流过程中遇到沟通困难问题,语言障碍阻碍三国青年参与项目<sup>①</sup>。同时,由于三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学分绩点规定等的差异,以及学分转换系统和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参与项目的青年可能无法在学习过程中很好地适应他国的培养体系,即使完成培养方案,可能也不会对自身发展提供特别大的帮助。总的来说,“亚洲校园”项目在政府主导、高校执行和青年参与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

为维护“亚洲校园”项目的长期发展,应设计一个相对独立的机制,比如设立联合基金会。项目顺利展开最重要的是稳定的资金支持,参照欧洲的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亚洲校园”可以设立由中日韩三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拨款的联合基金会,以尽可能减少政治不稳定对项目的影响<sup>②</sup>。在项目设计方面,应加强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机构或其他专业机构之间的协作<sup>③</sup>。因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努力,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驱动对于开展项目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个人、大学和团体也应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参与到区域合作中来<sup>④</sup>,两者相结合是最理想的。在“亚洲校园”项目中,在三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三国教育部门应更多地委托一些大学或相关的高等教育机构,并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同时,三国需努力将项目视为区域一体化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机制。而在学生参与体验方面,高校应高度重视学分转换系统、质量保障机制,在更紧密的协调制度和政策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如强化监管框架、资格认证、学分转化制度和教学质量保障<sup>⑤</sup>。

经过五年的时间,“亚洲校园”项目完成试点运行并持续深入展开,可以预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高校、企业参与到项目中来。持续性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会培养出越来越多有东北亚身份认同的青年人,塑造东北亚共同体意识,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时,在地域上,随着东亚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东北亚与东盟将开展更加深入的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亚洲校园”项目或得以实现雄心,辐射整个亚洲地区。总的来说,“亚洲校园”项目具有光明的前景,有望在未来改善三边关系及推进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① 郑晗 《浅议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方向——以“亚洲校园”计划为例》,《教师教育论坛》2018年第11期,第63~68页。

② Ja-hyun Chun, “Can CAMPUS Asia Program be a Next ERASMUS?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AMPUS Asia Program”,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4, No. 3, 2016, pp. 279-296.

③ Angela Yung Chi Hou,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udent Mobility Programs in SEAMEO-RIHED, UMAP, and CAMPUS Asia”,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11, No. 1, 2017, pp. 12-24.

④ S. J. Chan, “Deepening Intellectual Network in East Asia: Emerging Frameworks and Challenges”, 2015, quoted from Angela Yung Chi Hou,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udent Mobility Programs in SEAMEO-RIHED, UMAP, and CAMPUS Asia”,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11, No. 1, 2017, pp. 12-24.

⑤ Miki Sugimura, “The Function of Regional Network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John N. Hawkins, Ka Ho Mok, and Deane E. Neubauer, eds.,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ization in Asia Pacific*,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45-64.

## 五 结语

青年交流是长期的、根基性的事业。三国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群体间的人文交流更应受到重视。在中日韩青年人文交流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三国青年人文教育交流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文交流的规模和层次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和丰富。相关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更多的教育领域和学生群体之中，尤其需重视青少年交流。涉及的领域也应扩大和加强，如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同时，三国还应确保人文交流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并对项目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由中国教育部、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与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制订合作计划、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会议具体推进的“亚洲校园”项目，为三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和学者提供了教育交流的机会。目前，“亚洲校园”项目为期五年的试点阶段已经结束，并已成为中日韩三国较为成熟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对于促进文化教育提升，增进青年相互理解、加强友谊，推动三国未来一代的认知趋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日韩青年峰会、青年大使计划等每年定期举办的旗舰活动和其他交流活动，也为中日韩青年提供了丰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的机会。可以说，在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支持下，中日韩青年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

总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中日韩三国更需要保持合作的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人文交流不仅是国家间交往与互信的基础，也是深化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内，中日韩三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保持了良好的交流合作传统和态势，对推动三国青年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三国高校需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拓展合作项目的范围和种类，建立常态化的人员互访、研讨磋商及联合学位项目等合作机制，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进而为三国关系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 **China – Japan – Korea Youth Humanities Educatio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AMPUS Asia**

**Abstract** Youth exchang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i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exchanges. Currently,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core content in the youth exchange activities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a number of youth projects, involving many well – known universities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design, China – Japan – Korea youth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exchanges share high – 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through educational exchanges, to gain mutual understanding, to reac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nsu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to form a r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these exchanges will help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diverse values of the people from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king the “CAMPUS Asia” project as an example,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courses and activities provide knowledge reserves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for the future cooperation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have formed a certain cumulative effect and project reputation among the young el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ening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youth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exchange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s still of far – reaching significance. This is becaus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cooperation projects may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functional areas.

**Key Words** CAMPUS Asia; Public Diplomacy; Youth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Exchanges; Youth Exchanges; China – Japan – Korea Cooperation

**Author(s)** Dong Lia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iao Gaoyi,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iel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